

建一所“有历史的”科学博物馆

■本报记者 温新红



“达尔文的显微镜（约 1846 年于伦敦制造），他于 1847 年花了 36 英镑购买，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数千英镑，是一笔巨款。”

“1829 年斯蒂芬逊制造的‘火箭号’火车复制品，观众可通过按钮驱动火车头的活塞运动起来，可以观察蒸汽机如何驱动车轮运转。”

……

与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吴国盛教授以往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同，“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读起来很轻松，大图片，配上简短的文字，有展品背后的科学史，还评点了科学与文化的关系。

这一系列共 7 册，是吴国盛游历美英澳意法荷比等西方发达国家 39 座著名科学博物馆后的“成果”。不过，作为一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他的游历并非普通的游历，背后暗含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考。

不一样的考察

2014 年是吴国盛的博物馆“考察年”。年初

在澳大利亚进行了 20 天的考察，2014 年 4 月起考察英国、欧洲的博物馆，之后又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以及校博物馆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

只是吴国盛与多数人参观博物馆时看的“点”不同，他在“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这套书里，可以看到许多过去忽视的、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展品，通过这些藏品，也能很直观地了解到科技发展的历史。

事实上，国内还没有一套专门介绍欧美等国科学博物馆的书，这套书给读者以视角冲击外，带来的还有头脑上的震撼，因为吴国盛自己首先就被震撼到了——

1575 年的太阳系模型、蒸汽机引进之前的船舶模型、组合了转轮点火装置和火绳的手持火炮、18 世纪晚期关于葡萄酒发酵的实验装置、1888 年四缸四冲程的汽化器引擎、1900 年前后的自动织布机，还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生产的望远镜、钟表，早期的电话机、老式飞机，甚至中国古代流行的扶乩，等等。

许多收藏及展览让吴国盛印象深刻，深度考察后，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博物馆的展品加深了我对科学史的理解。正如古人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如果说这些对一位写出《科学的历程》，非常熟稔科学史的学者来说都是震撼，那么无疑，对普通观众来说会是一次绝好的科学史教育机会。

当记者问哪些博物馆令他感到震撼时，吴国盛表示有不少，像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博物馆、巴黎的法国工艺博物馆、伦敦科学博物馆、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因为他们有无比巨量的科技文物收藏。

其中最令吴国盛兴奋和激动的是伦敦科学博物馆，这家历史可以追溯到 1857 年的博物馆包括 5 个分馆，目前有超过 30 万件藏品，包括现存最古老的蒸汽火车头普芬比利号火车头、第一台喷气引擎、巴比奇的差分机和万年钟等。丰富的藏品，以及它把科技遗产与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结合的综合布展理念，“正合我心目中的科学博物馆的形象”。

漏掉的科学工业博物馆

虽然科学史家本是天然地关注科学史博物馆，但在此前吴国盛并没有过多了解、思考科学

博物馆，经过这三年走访了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他谦虚地表示，现在“有一些心得体会”。

博物馆这一概念来自西方，是现代社会的一道文化景观，也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所以，当下要研究中国的科学博物馆问题，必须先正本清源，回到西方的语境之中，考察它的历史由来和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广义的科学博物馆包括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科学中心三种类型，其中自然博物馆主要收藏“动、植、矿”等自然标本，科学博物馆主要收藏科学仪器、工业产品等人工制品，科学中心则基本上是零收藏，主要展出互动体验型展品。狭义的科学博物馆一般指科学工业博物馆。

“我国的科学博物馆事业可能完全漏掉了综合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吴国盛说。

目前中国的科技类博物馆以及场馆，一般只有自然博物馆和科技馆，相当于西方国家科学博物馆中的第一类和第三类。

有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的各类博物馆超过 4500 家，自然科学类近 200 家，科技馆 100 多家。这些科技类博物馆多是专题性的、专业的博物馆，缺乏综合性的科学博物馆。

相对于国外的博物馆，中国各类博物馆中的科技元素也是比较缺乏的。“像美国的历史博物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科技史的内容，而我国历史博物馆显然没有这么多，尤其是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科学的地位表现得很不够。”

吴国盛认为，一百多年来，因为科技的引进和科技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博物馆应该展示这种变化。

三类科学博物馆其实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就是说这三类博物馆可以同时存在，而且是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渗透。

中国之所以会“跳过”第二类，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可能使我们忽视科学技术的历史维度和人文维度，过于单纯关注它的技术维度。

因此，关注“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是中国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走向科学博物馆，回归科技馆的博物馆本性，是未来中国科技馆事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种思路。

建设中国的科学博物馆

在伦敦科学博物馆里，瓦特工作间是从原址整体移来的，“非常震撼，瓦特的那些展品让我们这些观众深深感受到孤胆英雄是怎么撬动世界历史的。不在博物馆里，不面对这些实物，是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情感的。”吴国盛对此很有感触。

反观国内，却缺少这样一种以实物为主的科学博物馆。

“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经验教训和辉煌成就，未能通过博物馆这种形式予以表现，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在吴国盛看来，中国并不缺乏资源，如明末传教士带来的科学仪器设备、显微镜、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地图等，还有像 19 世纪洋务运动以来的开矿山、修铁路等，将这些展览摆出来，也会相当震撼的。

因此，吴国盛表示，“当我进入科学博物馆领域的时候，痛感需要对科学博物馆事业正本清源，否则尽管有国家雄厚财力的支持，也不一定能把科学博物馆事业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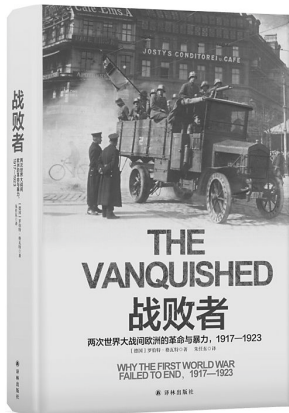
毋庸置疑，中国的科技馆建设目前主要是科学中心模式，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互动体验型展品对于在青少年中开展科学教育也是很好的场所。只不过，缺少历史收藏的科学博物馆这个环节，显然是不够的。

基于中国的广义科学博物馆事业缺失了狭义的科学博物馆这个环节的看法，吴国盛呼吁，“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和深厚历史传统的大国，必须有主要由历史收藏和科技文物来支撑的科学博物馆，应该有体现自己厚重科技发展历史的科学博物馆。”

吴国盛目前正在筹划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国际科学史界近几十年越来越强调仪器设备以及实验技术对于科学的影响，因此，也越来越关注科技博物馆。西方大学的科学史系通常承担着维护科学博物馆的任务，比如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同时管理着历史性的科学仪器陈列馆，剑桥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与剑桥科学史博物馆联体运作”。

而现在吴国盛的目标也是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与清华科学博物馆联体运作，“清华科学博物馆将会建成真正的科学博物馆，以历史收藏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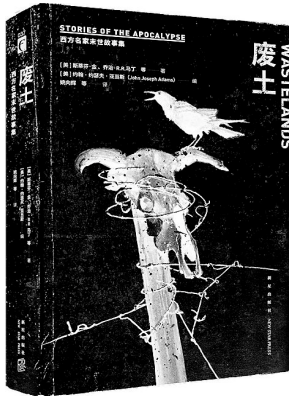
荐书



《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1917—1923》，德·罗伯特·格瓦特著，朱任东译，译林出版社 2017 年三月出版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来说，1918 年 11 月 11 日即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对于战败国来说，它却是一场巨大暴力灾难的开始。

本书作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及和平条约的签署，并未解决困扰欧洲诸多国家的民族和边界问题，战败国国内及国家间持续数年的暴力冲突，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在欧洲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且其直接后果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



《废土：西方名家末世故事集》，[美]约翰·约瑟夫·亚当斯编，美斯蒂·芬金、乔治·R·马丁等著，姚向辉等译，新星出版社 2017 年二月出版

饥荒、死亡、战争、瘟疫。这些据说预示着圣经般的天启——“大决战”和“世界末日”。但在任何重大灾变过后，都会有幸存者活下来，末世幻想小说就是推演那些幸存者将过上怎样的生活。末世幻想题材的第一篇重要作品是创作于 1826 年的《最后一个人》，作者是科幻鼻祖、著有《弗兰肯斯坦》的玛丽·雪莱。

本书聚集了 22 位科幻文学大家所写的末世故事，它们风格各异，有些略显牵强，读着玄乎；另一些则合情合理，极易引人想象。其中几篇充满奇思妙想，还有不少带有恐怖色彩，但所有故事都在探讨同一个问题：在我们所知的世界终结之后，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

激活古代神话的当代价值

■张春莲

还记得东荒俊疾山的素素吗？还有昆仑虚的战神墨渊，青丘之国的九尾狐白浅……2017 年，电视剧和同名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相继播出，红极一时，把一个神奇瑰丽的神话世界展现在了观众眼前。剧里人物活动的俊疾山、昆仑之虚、青丘之国等地点，毕方鸟、九尾白狐，还有害得万人迷的夜华君失掉一只胳膊的樗杌凶兽等“神奇动物”，在《山海经》里都有据可查。然而，碎片化的点缀终究无法让人拼凑起神话的完整图景，它们离真正的古代神话到底有多远？在将古代神话资源娱乐化、产业化加以消费的同时，它们激发了什么？又消解了什么？古代神话于我们今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除了猎奇、装点、娱乐以外，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诸神纪》中，作家严优对这些问题，交出了自己的一份答卷。在严优看来，古代神话不应该是精神可贴、文化燕窝汤，而是“包含一切文化本原基因的骨髓干细胞，是所有表达的元表达，是所有意义的元意义，是所有结构的元结构”。神话不仅原生性地表达着民族精神中最稳固最恒定的部分，承载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也和“人类内心底层的问题、人类内在的奥秘”相关。

在《诸神纪》里，无论是“垂死化身……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的创世大神盘古，在“四极废，九州裂”的情形下“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大母神女娲，还是“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神农氏，“诛凿齿，杀九婴……上射九日”的大羿，都体现了一种不畏艰险、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悲剧意味和崇高之美。可以说，这种不畏艰险的生存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之魂。

与在史家和儒家典籍中被历史化的温文尔雅、“伟光正”的诸神形象不同，《诸神纪》里描绘的上古诸神大多充满野性之美和伟岸之力：喜欢追着自己尾巴跑的混沌、半人半蛇的女娲、人首豹尾的西王母、铜头铁额的蚩尤……这些朴野的形象和他们身上那种气吞山河、震撼天地的力量体现了先民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对自然、生命、神

性之力的崇拜和讴歌，对在科技文明的重压下生命力日渐萎顿的现代人不啻为精神的解毒剂；而上古神话当中所体现的中国智慧，通过作者的“拼贴”，也得到了生动而又不乏深度的呈现：混沌神话所体现的中国人混融无间的宇宙观、上古神树的故事背后体现的中国人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南楚大司命神话背后体现的“方生方死，生死一体”的生命观，等等，对深陷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伦理危机的现代社会，都是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可以说，中国古代神话拥有高远而深刻的文化内质和精神内涵，理应成为一种优秀的国民教育资源，然而，迄今为止，优秀的神话教育、普及作品屈指可数。这一方面是认识不足所致，另一方面，却也与中国古代神话自身碎片化的、不成体系的存在形态有关。

此外，深奥难懂的古汉语也往往使普通大众对其敬而远之。怎样让普通读者亲近神话、体会到神话内涵的精神？在《诸神纪》里，严优以接近“谱系化”的逻辑方式对杂乱的上古神话进行了系统的归类，从总体框架上为读者了解中国神话世界建构了一个清晰的、富有逻辑的顺序，而且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神话也在这一框架中得到了一定的展现。《诸神纪》还对古汉语神话的现代重述和读解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书中的每个主题都包含几个板块，其中“故事文本”是作者体系化以后重述的神话故事，活灵活现又述之有据。“辨书君曰”则是对故事的解读和阐释，妙趣横生又不失学理。全书随处可见作者灵动、俏皮又时尚的用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舒宪说：“即便我们迷失本心、找不到方向，神话始终‘为人类提供（着）回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愿神话永远成为滋养我们生命的“厚土”。

《诸神纪》，严优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8 月出版

中国的柯林斯在哪里

■刘华杰



最近几年，博物学这样一门老掉牙的学科时常被提起，甚至有中学、书院、银行和地产商请我讲这方面的内容。《发现之旅》《植物学通信》《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看不见的森林》《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簿》等博物类图书在国内也卖得相当火爆。多少眼红的出版人征询我的意见，希望也能做出几本畅销的博物书。

明眼人看得清楚，这番热闹并非意味着在“现代性”泛滥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出版界、教育界立刻就领悟并认可了博物学传统。就像现在一大堆出版物仍然把 natural history 想当然地、错误地翻译成“自然史”一般（其实在上述词组中，history 根本不是历史的意思，而是探究、描述的意思），多数人并不知道博物学是怎样的学问，此时学者想复兴它意味着什么，将面临怎样的巨大困难。

我倒常常帮人家瞎参谋，不过迄今未参谋出一部畅销书来！畅销与否受许多因素制约，况且，参谋的时候我内心想的仍然是书本身是否有趣。

对于上述列举的销路不错、我个人也高度肯定的图书，从图书策划、出版的角度看其实我并不看好。更应该坚持下去，持续做出好书。长期以来，倒是有一套博物学经典值得推荐，一是书本身别致有趣，二是该套丛书的组织策划经验值得借鉴。我若在出版社，宁愿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

这套丛书 1942 年开始策划，1945 年首批上架，到了 2016 年共出版 133 种。按规模计，此丛书不算太大；按出版速度计，72 个年头坚持下来，平均一年才出版 1.85 部。但是它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一套博物学丛书。其中《蝴蝶》（5.3 万册）《英国的植物》《伦敦博物志》《英国的地质和地貌》《高地和岛屿》（12 万册）《遗传与博物学》《海岸》《蜻蜓》《植物插图艺术》《蜘蛛的世界》《英国猛禽》《昆虫博物学》《花的授粉》《蕨》《洞穴和洞穴生命》等不但影响大，销售也相当成功。半个多世纪以来，丛书的每一种在选题策划、写作、封面设计等各个环节都同时考虑了学术与商业两个方面，从未忽略其中任何一方。

这套书的名字叫“柯林斯新博物学家”（New Naturalist）丛书。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在我的建议下用多年时间引进了其中几种，到 2017 年已经印出 4 种。其中的一本书名就叫《新博物学家》，作者马伦根据大量史料和采访，讲述了柯林斯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历史，信息量巨大，特别值得中国出版界策划选题时参考。

“有一个人特别要提到，那就是朱利安·赫胥黎，他不仅是一位才华卓著的科普普及者，还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出版商 W.A.R. 柯林斯的商业资源同赫胥黎的才华相结合，奠定了《新博物学家》成功的基石。柯林斯能将书推向市场，赫胥黎则能找到适当的作者。”朱利安是著名演化论（也称进化论）学者，他弟弟阿道司是小说家、哲学家，著有《美丽的新世界》等，他们的爷爷是托马斯，那个被称作达尔文“猎犬”的博物学家。

这位朱利安，非同一般。出版商柯林斯看重他的学术地位、活动能力和家族声望。正是这位朱利安担

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1946 年他起草了 62 页的《UNESCO 的目标和哲学》。还出任了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的主席，这与博物学直接相关。朱利安并不只是挂名，《新博物学家》一书用翔实的资料证明，自 1942 年 4 月柯林斯登门拜访时起，朱利安就从头融进这套博物学丛书的策划，做了大量具体的组织、约稿和讨论工作。书中甚至稍有夸张地说：“赫胥黎几乎是凭一己之力让博物学在科学界重获尊严。”

《新博物学家》讲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用相当长的篇幅揭秘了埃利斯夫妇如何想办法为系列中一部又一部图书设计极具感染力和标识意义的封面。上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彩色摄影和彩色印刷刚刚起步，丛书坚持内插大量彩色照片，但封面则坚持使用只有 2 到 4 种颜色的近似版画风格手绘图来设计。即使在今日，早期的封面设计依然是第一流的，对图书营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柯林斯新博物学家丛书”再好，也是国外的，内容是以英国为中心展开的。我们可以借鉴，但并不全适合中国读者，特别是初级博物爱好者。

中国当下复兴博物学，必须立足自己的国土，针对我们自己的山川、植物、动物和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出版一系列中文读物。但想搞“短平快”出版是做不了如此跨度很大的事情的。

谁是中国的朱利安·赫胥黎？谁是中国的柯林斯？一套丛书在中国能坚持半个世纪甚至 70 年吗？博物学是“没用”的学问，是死掉的学术传统。谁还当真为此奉献？

不过，博物虽然说无用，却与“绿水青山”有关，与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有关。博物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属于大地，我们是一种普通的动物，我们是大自然的一员。博物能让我们感受“适应”的重要性，可以适当平衡现代性的疯狂。

作为一名普通的北京读者，我希望某家出版社能出版《北京的蝴蝶》《北京的地质地貌》《北京的蘑菇》《北京的人侵物种》《北京城市常见植物》，能够更新 1994 年版的《北京植物志》。你的家乡在哪里？你那里可有本地动植物手册？



《费马最终定理》，[日]冲樱皮著，金明兰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 年 9 月出版

这部作品曾被 BBC 改编为著名英剧《指匠情挑》。讲述了在伦敦郊区的一个大庄园内，居住着李先生和他的外甥女莫德，李先生性格乖戾，驱使莫德终日在图书室里整理和朗读藏书。可怜的姑娘从小到大都未踏出过庄园一步，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某日，一位陌生人的闯入，给莫德干涸已久的心灵带来生机，他就是来教莫德画画的里弗斯，可他的真实身份竟然是一个贼。这是一部反转又反转的哥特式悬疑，一部充满 19 世纪珍闻的纯文学，一部洋溢着生命体验的女性书写。

（喜平）